



# 記敦煌寫本的佛經

(續完)

王重民

在吐蕃統治時期和張氏、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就不然了。由於經濟文化和唐朝斷絕，或者僅能有很少的交通，敦煌寫經就又幾於完全回復了它的地方色彩。但由於時代不同，佈施的人中增加了大量的農民手工業工人，他們把終年勞苦得來的一點點金錢佈施到寫經上面，固然是被欺騙了，但有些人在誓願中也道出了他們的真正志願和要求。如斯 544 的『佛說閻羅王授記令四象送終生七齋功德往生淨土經』的題記云：「奉爲老耕牛一頭，敬寫『金剛』一卷，『授記』一卷，願此牛領受功德往生淨土，再莫受畜生身」。又同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依「西川過家真印本」抄寫的小冊子，也有題記說：「奉爲老耕牛神生淨土，彌勒下生，同在初會，俱聞聖法」。在佛的面前，充分表現出了農民的本性和愛護勞動的思想。

由於農民、手工業工人大量參加了佛經的佈施，又因爲受金錢的限制，不能寫大經，於是寫小經的風氣在這一時期內，尤其是張氏、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內，更爲盛行。如前面舉的『金剛』、『授記』都是小經，其中最通行的也是數量最多的，是『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如前所述，北京圖書館藏的就有一三卷，倫敦也有二八八卷，敦煌所出這一經的總數，說有一千個寫本是不會過多的。斯 1995 有後題云：「佛說無量壽宗要功德決定王如來經」卷第一萬五千五百十九」。其意一則想表明『無量壽經』的全名(或異名)，一則想指出在他們那裏已經抄寫了一萬五千五百十九個卷子。這個數目聽來很嚇人，細算起來不是不可能的。

在現存的一千來卷『無量壽宗要經』中，有好多卷的寫經題名是相同的，如田廣談、張涓子、張良友、令狐晏兒、張畧沒藏。他們都是寫經出賣的所謂「寫經生」，他們的寫本留存下來的，最多的有四十多卷，少的有十來卷。其中張畧沒藏是一個少數民族。他們不但寫佛經，還寫其他書籍，如斯 692『秦婦吟』是九一九年張盛友寫的，他在末尾題了四句詩說：

「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麥，  
高代不可得，還是自身災。」

他在辛苦的寫書中，悟到了窮人只有靠自己的手。「高代」即「高貸」，指高利貸。他說窮人就是想借高利貸都借不來，隨後就說，即使借到手，也「還是自身災」，所以還是多寫一卷，就能得五升麥的！

吐蕃統治時期和張氏、曹氏兩歸義軍時期敦煌寫本佛經的另一特點，是有一些爲本地的佛教大師們學習用的佛經註解和他們新譯、或者講經給學生聽，而由學生記下來的筆記。這些佛經的新譯本和新註解，都沒有傳入國內，而是自從敦煌石室開發以後，才被世人知道的。

如前面所舉的最長卷子中的『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就是當時當地的佛教大師們做爲學習用書而抄寫的。當時當地的著名大師法成曾在甘州修多寺翻譯了一些新的佛經，他所講的『大乘稻芊經』和『瑜珈師地論』，曾由聽講的學生記出了很多的筆記，這些在舊有的佛經目錄或佛教傳記上是沒有記載的。法成譯經中寫

本最多的，是『諸星母陀羅尼經』一卷。另外伯希和劫走的還有『薩婆多宗五事論』（伯2073、2116）一卷，『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伯4882），『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一卷（伯2139）。他講解的有『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一卷。至於『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有的題為『大乘稻芊經隨聽手鏡記』）和『瑜珈師地論分門記』（有的題為『瑜珈師地論隨聽手記』）的寫本，就更多了。法成譯『薩婆多宗五事論』題「丙寅年甘州修多寺道場譯」，而『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則題「癸丑年沙州永康寺集筆記」，「丙寅」應該是七八六年，則癸丑當為八三三年，均在吐蕃統治時期，故不題年號。但由此可以證明，法成的早年是在甘州譯經，晚年才到沙州（即敦煌）講學。他的其他著作還有『歎諸佛如來無染著德讚』（伯2886）。

敦煌佛經在不同時期中的這些鈔寫上的特點，只要掌握了上述情況，就能知道一個大概，還可作為鑒定上的參考。

現在應該談一談敦煌佛經的價值了。

敦煌佛經的價值應該說：一是寫本之古，足以校勘宋代以後開雕的各藏，二是古佚經、佚文之多，可以補足宋代以後各藏的不足；三是有一些佛教史料過去失傳，佛教史上一些未決的問題，只有利用了敦煌佛教史料以後，才獲得了解決。單就這三點來說，就可知道它的價值是非常鉅大的。

如前所述，敦煌佛經寫本的年代，包括第四到第十的七個世紀，其中北魏時代的寫本當然非常寶貴，而隋唐時代（唐代斷自天寶以前）由於多據官本，紙墨書法又都好，也有很高的校勘價值。現在我們對於宋刻谷藏已經視為珍品，翻印校勘不遺餘力，但對於比宋藏刻本還古到五、六、七百年時間的敦煌佛經寫本，除了一些極個別的卷軸，和日本校勘『大正大藏經』用過的一些敦煌佛經寫本作校勘外，還有很大量很寶貴的寫本未經利用過。至於敦煌佛經中所包含的古逸經，那就更重要了。因為屬於這類的佛經，都是在古代通行一時，在佛教史上造成過一定的影響，竟因原本或原譯本失傳，在最近九百年間，研究佛經和佛學史的人，只知經名而未見經本，或者連經名都不知道了。敦煌佛經的

發見，使那些古佚經又和世人相見，當然是佛教史研究上的一個極其重大的事件。所以當被劫餘的八千卷敦煌佛經運藏在京師圖書館以後，我國佛學專家李翊灼先生就在這方面作了廣泛的研究。他遍閱了那八千多卷佛經，從中選出了一百五十九種古逸經，編成了『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並附『疑僞外道目錄』，今有一九一二年『古學彙刊』排印本。後來日本校印『大正大藏經』時，又印入『昭和法寶目錄』內。這部目錄著作可以說給研究敦煌佛經打開了一個新的門徑。隨後日本的佛教團體和佛學專家在這一目錄的影響下，利用倫敦、巴黎和日本私人收藏家所藏的敦煌佛經，經過了十多年的努力，校訂出了一八八種古佚經，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內，成為第八十五卷的『古逸部』和『疑似部』。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貢獻，給佛經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引起佛學研究者很大的注意。

在『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校印的這一八八種古逸經和疑似經中，有很多北朝時期的佛經解義，如『法華義記』卷第三，『維摩經義記』卷第四，『華嚴經義記』卷第一，『涅槃經義記』『勝鬘義記』『十地論義疏』第一、第二殘卷。唐代的逸經逸注就更多了，最重要的如道氤撰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二卷。關於法成的講解，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決』、『瑜珈師地論分門記』和『瑜珈論手記』等，還有關於禪宗的一些經論。最古的寫本『法句經』，也作為『疑似經』校印在這裏。『法句經』的翻譯時代較早，和梵本校對起來，有些句法不相同，但那是翻譯人時代局限性所造成的，不能因此說那個經本有什麼可疑。若是作為古譯墨本來看待，才算比較合理。又敦煌佛經多是殘卷，有的有前題無後題，有的有後前題無前題，還有一些前後題都沒有，這就給編校人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大正新修大藏經』中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在這一類的困難中發生錯誤。如『古逸部』既根據伯2132和2173兩卷，校錄了道氤的『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兩卷，又根據伯2330，校錄了『金剛般若經疏』一卷。但這裏的『金剛般若經疏』的全文，已經包括在『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的上卷當中，讀者一對就能

立刻覺察出來。所以『金剛般若經疏』就是『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的另一個寫本，應該用它（伯2330卷）校伯2132卷。但由於伯2330卷沒有前後題，編者不知道，就出現了這樣的錯誤。舉這樣的一例，意在說明『大正新修大藏經』的『古逸部』和『疑似編』雖說已有很大的貢獻，但編校的工作還有欠缺，利用的材料也不完備，以致有許多佛經、佛文，有頭無尾，或有尾缺頭，有前一卷缺後一卷，或有後一卷缺前卷，這些情況還是不少的。但這並不是不能補救。『大正新修大藏經』的這兩部分的取材，主要是以斯坦因劫經爲主，又稍稍參用了一些伯希和劫經做補充。這就說明：對於伯希和劫經沒有充分利用，對於北京圖書館藏的八千多卷更是一點沒有利用。前舉李翊灼所編的『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就有一五九種，每一種都有若干復本，可以互相補充，而其中可以補充『大正補修大藏經』的『古逸部』和『疑似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以敦煌佛經中的古寫本和古佚本，對於校補宋、元藏經來說，還有很大功用，而這一功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在敦煌發見的古寫本、古佚本佛經中，關於三階教和禪宗兩個宗派的經文很多，也很重要，因此也有必要在這裏作一介紹。

三階教是六朝末年興起的一個宗派，在唐代很盛行。由於這個宗派與武則天的政治改革有關係，所以初唐時期達到了極盛，有不少三階教經典在這個時期（618—781）傳到了敦煌。三階教的史料，雖說在石刻文字和其他文獻中保存了一些，而三階教的經典只在日本還有殘存，在中國可以說一卷都沒有了。只有敦煌石室重開之後，我們才又獲得了三階教的豐富材料。其中重要的經典寫本有『三階佛法』卷第一（斯2683<sub>2</sub>）、和卷二（伯2059）<sup>2</sup>，有『三階佛法蜜記』卷下（伯2412）。還有抄寫最好的，也是三階教中一部比較重要的經典『佛說示所犯者法鏡經』一卷（斯2423）。此外，還有『三階佛法發願法』（斯1306）、『無盡藏法畧說』（斯2137）、大乘界無盡藏法釋』（斯721）、『對根起行經』（斯2446）、『信行□集真如實觀起序』卷第一（斯212）等。

禪宗的興起稍前於三階教，而自第十世紀三階教基本衰滅後，禪宗有更長足的發展。禪宗的初期經典和史料，則大部份已經散亡，也是敦煌石室重開以後，才獲得一些很重要的古禪宗經典和史料，在研究我國禪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謂禪宗的初期經典和史料，指菩提摩（Bodhidharma）以後的禪宗。這時期的經典和史料，也應該是初唐傳入敦煌的，但禪宗在敦煌有了新的發展。敦煌所出的禪宗經典和語錄，都是天寶（七五五）以後寫本。正由於禪宗天寶以後在敦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授，所有寫本都是當時傳授學習用的讀本，一般說來書法都不很佳。

在敦煌通行的禪宗經典，有神會和尚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伯3047、2045），和『頓悟無生般若頌』（斯468、5619<sub>2</sub>），還有他的『語錄』（伯3047）、『荷澤和尚五更轉』（斯6103<sub>2</sub>）等。另外，寫本很多的有『道凡趣聖悟解脫宗修心要論』一卷，（忍和尚撰，伯3434、3777、斯2669<sub>8</sub>、3558<sub>8</sub>、4064<sub>8</sub>），『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決』（智達禪師撰，禪師名陳琰，秀和尚弟子。伯2799），『南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斯2583<sub>8</sub>、2669<sub>4</sub>），『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慧光集釋，伯2162），『南陽和上頓悟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三藏法師菩提達摩絕觀論』（伯2045），『頓悟大乘秘密心契禪門法』（惠達和尚撰，教86）以及『圓明論』（服6，伯3359），『觀心論』（斯2595），『澄心論』（伯3777、斯3358<sub>8</sub>、4064<sub>8</sub>）等。世傳的『六祖壇經』，雖說有宋代以後的各種刻本，敦煌所出寫本應該是現存最早的本子。這個寫本爲斯坦因所盜劫，它的原題是『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下題『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斯5475）。

又關於禪宗的史料，在敦煌流行的，有『楞伽師資記』一卷和『歷代法寶記』一卷，寫本都很多。『楞伽師資記』，淨覺撰，有五個寫本（伯3294、3436、3703、4564、斯2054）『歷代法寶記』又名『師資血脈傳』，又名『最上乘頓悟法門』，也有三個寫本（伯2125、3717、斯516）。

禪宗經典中另一件最可寶貴的資料，是『頓悟大乘正理決』，大概是公元七九二—七九四年間由敦煌赴拉薩的「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與印度僧人辯論的記錄。卷端有「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的序文。王錫在河西未被吐蕃佔據以前是河西觀察使的判官，敦煌陷蕃以後，就留居在敦煌。他當是這次赴拉薩三人中的一人。他有時自稱爲「破落官」，給吐蕃贊善上書則稱「破落外臣」，大概是吐蕃佔據敦煌以後他就出了家，或者作了居士，所以不直接稱臣。他在序文中詳細序述了這次在拉薩與印度僧人的辯論。序云：「厥茲蕃國，俗扇邪風，佛教無傳，禪宗莫測。粵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筌，愍萬姓以長速，演三乘之奧旨。交聘鄰邦，大延尼象，於五天竺國請婆羅門僧等三十人，於大唐國（此時吐蕃與長安已斷絕交聘，則此「大唐國」應指敦煌）請漢僧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淨域，互說眞宗。我大師密授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沒盧氏一自虔誠，劃然開悟，贊普姨母慈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三十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首自申年（七九二？），我大師忽奉明詔曰：婆羅門僧等奏言，漢僧所教授頓悟禪宗，並非金口所說，請即停廢。我禪師乃猶然而笑曰：異哉此土衆生，豈無大乘種性而感魔軍擾動耶？於是奏曰：伏請聖上於婆羅門僧責其問目，對相詰難，校勘經義，須有指歸，少似差違，便請停廢。帝曰：俞，婆羅門僧等以月繫年，搜索經義，屢奏問目，務掇瑕玼（疵）。我大師乃心湛眞筌隨問便答，若清風之卷霧，豁睹遙天；喻寶鏡以臨軒，明分象像。婆羅門等隨言理屈，約義詞窮。既小乘轍亂豈復能軍，看大義旗揚，猶然賈勇。至戊年（七九四？）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訶衍所開禪義，究暢經義，一無差錯，從今以後任道俗依法僧習。小子非才，大師徐謂錫曰：公文墨者，其所問答，頗爲題目，兼制叙焉，因目爲『頓悟大乘正理決』。這一史料，當然對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禪宗輸入西藏的歷史，有着很重要的價值。

關於禪宗輸入西藏的歷史，曾經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現在看來，應該以這件史料爲最早也最可靠；後來一些說法，大概就是

從這件史料附會出來的。用藏文留傳下來的『兩藏王統記』，記載着赤松贊王時，邀請印度的蓮華戒與中國大乘和尚辯論的故事。說：「大乘和尚由支那入藏，於中觀見分頓門巴與漸門巴二宗與內道之見不合」，於是從印度請求蓮華戒，辯論結果是蓮華戒得勝了。後來大乘和尚欲還中國時，以靴一支，遺藏中，並言曰：「此後西藏將仍有宗信余之中觀見者」。但在其他漢文史料中，則與這一傳說相反，而與敦煌本『頓悟大乘正理決』的王錫序文所說接近。舊日的一般說法，說中國赴西藏的大乘和尚是摩訶衍。由於玄奘的梵名是摩訶衍（Mahāyāna）。並說傳那位大乘和尚就是玄奘。後來有人發見玄奘的時代較早，不可能是他，就認爲是『頓悟大乘正理決』中的摩訶衍。現在看來，被聘請的大禪師摩訶衍是敦煌人，那時候正是吐蕃與唐朝斷交的時候，不可能直接從唐朝請人。按其時代、人名及辯論內容看來，就是『頓悟大乘正理決』中故事。也就正是這個摩訶衍。在最近三十年內，蘇聯人奧伯米勒（E. Obermiller）曾從一些梵文與藏文，尤其是列寧格勒科學院的亞洲博物院的圖書館中藏的一件用西藏紙鈔寫的梵文古寫本中，發現記載着與這件敦煌材料更相近的故事。這說明不但在漢文文獻中流傳着這一故事，而且在梵文或藏文的文獻中也得到了佐證。敦煌的這個文獻，是其他一切文獻的根源，也應該就是這一故事的根源。這一發見，在禪宗史中有着很重要的意義。

至於敦煌所出的將近三千五百卷的藏文寫本，也主要是佛經。其中絕大多數已經裂成碎片，當然也有一些較長的卷子。這些佛經的內容，基本上也和敦煌所出漢文相似，如『金剛經』、『蓮華經』也是較多的。此外，在敦煌流通的禪宗經典也有一些，如伯希和切去的藏文寫本第116、117等號卷子，經過拉盧女士的研究，斷定都是屬於禪宗的內容，117卷是屬於頓門的。

回紇、粟特、于闐等文的卷子，由於于闐國與歸義軍有姻親的關係，一些是有歷史價值的，而回紇文、粟特文卷子也主要是佛經。著名的粟特文寫本『善惡因果經』（伯3515）已由高第歐（Robert Gauthiot）翻譯並校印了。（完）